

~~311~~ 311

再生

日八十月一年七十三 刊 週 期九九一第

號七〇七第照執理管政郵東中 類紙聞新類一第為認記登政郵華中 號四九五二第字警證記登誌雜部政內

社 言

異哉九龍城事件

中國新聞事業上的兩重桎梏

從歷史觀點縱談中國之治與亂

對日和會的基本問題

自由主義怎樣了

我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看法

中國歷史上之中樞制度 (續)

美國與世界

· 黃一裳 ·

· 黃河清 ·

· 黎 玄 ·

· 拙 文 ·

· 方建民 ·

· 杜 衡 ·

· 沈立鈞譯 ·

行發社版出生再

(元十五價售期本)

(版出日期星逢)

號一十三弄九四七路園愚海上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社 言 異哉九龍城事件

九龍城事件終於爆發了！

九龍是香港對岸連着陸地的一個市區，九龍城則是九龍市區裏一英里方圓的一塊地方，有兩千多中國同胞稠密地住着，因為生計的艱難和缺乏正當的管理，市容陳舊凋敝，為一般旅港的高等華人足跡所不經，若不是這次出了逼遷事件，恐至今國人還弄不大清楚這是什麼一個所在。

香港政府將在近兩月前，以防火防疫為理由，告示居民要把破舊的木屋拆毀，並令居民一律遷出，居民惘於流離之慘，急向中央政府呼援，外交部遂派兩廣外交特派員郭德華向港督交涉，一面郭並曉諭居民：國家必能盡其保衛之責，不會妥協讓步。一月來外交部的表示也似頗有把握，我們認為收回香港一節，固為政府目前所不欲譯，至少保全這國土邊崖上的同胞的一些些生存權總無問題，深信我們獨立自主的外交，在這上面還裁不了跟斗。

但本月五日起，港方却真動了手，高級官員率領着武裝警察，如臨大敵，將屋拆光，十二日復因居民困守而閉槍，並拘禁代表科以徒刑，居民惶駭哭號，救死扶傷，勢態愈趨嚴重，外交部再令特派員送達抗議，提出解圍要求，港政府則一再發表聲明，振振有詞，交涉前途，未見眉目。

我們對於這樣一件慘厲的流血事件，推因斷果，頗覺有些茫然，勝利之前，我們是無外交的弱國，同胞在國內國外，遭外人槍殺辱罵之事，極屬尋常，外交當局一套老公式，所謂懲凶，賠償，道歉，保證等等，多半不被理會。勝利之後，我們已忝列一強，但逼遷，越南與南洋，仍曾有過僑胞被屠殺的事實，而外交當局抗議重重，也未收多少保僑之效，不過我們反躬自省，僑胞遠寄異邦，為目下政府海空軍力所難達，加以國威似有實無，外交而無武力後盾，僅憑事後的抗爭，實屬空洞乏力。但今番九龍城事件，却當別論，防疫而必須拆屋，拆屋而必須驅人，驅人而必須迫害，迫害而必須判刑，再按再厲，蓋目下已無中華民國之存在，我方則惟有書面抗議，惟有以顧念人道之義動之，及審其真不睬理，亦惟有以停止行動為要求，在港方則面目猙獰，蠻幹到底，而我們則始終方巾博領，規行矩步，此所謂「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歟？

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到底九龍城是誰的？在一八九八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上面載着一句糊塗話：「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兵，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畢竟九龍城是誰的呢？五十年來不出事情，便也無人深究。雖自一九三三年港方曾五次準備行動，我當局竟未重視。自五日拆屋以後，我們聽到郭德華對居民代表的解釋是「主權屬中國。治權屬英國，產權屬廣東省政府。」若果這個解釋是對的，則英國不能拆屋驅民，置中國政府於不顧？若果這個解釋是靠不住的，則中國政府今後又藉何途徑以謀「澈底解決」？若果這個解釋是全錯的，則英國人在自家統治下為所欲為，我們又何可與抗。若果這個解釋儘管正確而英國人偏高興這樣幹，則今後還談什麼邦交，還說什麼國際信義？

香港政府在戰後對中國的態度是有疑問的，容納反中央的軍人政客，便利許多毒害國民經濟的走私與投機商人，最近雖有國務協定，我們甚訝其遲，何況在施行上問題尚多。在港方未嘗不以為我們政府在政治經濟兩方面，有望於他們者正多，拆毀幾棟破房子，迫害少數窮住戶，那會惹起什麼交涉。這是忽視了中國國民的民氣，而沒有改舊日帝國主義的根性，中國國民的民族自尊心並不因兩年來的內戰困乏而少減，英國人在戰時對我們的協助，我們是感佩的，但在戰前和抗日初期對我們那些暴行和淡漠，將因這次九龍城事件，引起我們剖巨痛楚的回憶。港政府不說大英帝國殖民地統治的作用，其蠢暴不足責。但以英國政府飽經大英之憂患與教訓之深，誰能誰友，防患未然，應有進一步的警覺。我們深知這次大戰沒有改好任何一個國家的脾氣，第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會議固然埋下了戰敗國復仇的炸藥；第二次大戰後的幾個會議，却更充滿了一羣「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惡客，吵吵嚷嚷連一個結論都弄不出。中國對外一向老實無邪，除去關於自國前途安危不能不拿出一句話來——例如這次爭對日和會的否決權，其餘國際間的爾非我虞，中國不想，也無力參預，與人為善是今日的外交政策，但若以為中國目下在自相殘殺中，豈能共禦外侮，則是絕大謬誤，要看清今日的內戰不是八民與人民為敵，而人民對於九龍城事件之注意，却遠過於內戰的雙方在一個大城鎮的得失，英國朝野不乏熱心於遠東問題與中國問題之人士，幸勿以九龍城事件為地方事件，可以聽港督便行事；其影響中英兩國關係之大是不堪想像的。

我們有慨於外交當局之穩而不健，兼寄望於老謀深算的英國人士。

★★★★★

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的兩重桎梏

★★★★★

· 黃一裳 ·

新聞事業是新興的事業，只有現代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環境，纔幫助了新聞事業的健全發展，雖然新聞紙的起源，並非短暫的時間，但新聞紙確是現代文化的象徵。在最近一世紀中，新聞事業對於世界安危人類生活，起了巨大無比的影響；今後新聞事業，將繼續開來，發生更大的作用。我國的報紙在最近五十年內，也坦負了它的本分的責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於是新聞事業成爲受人重視的事業，新聞學成爲社會科學的一部份。

在新聞科學的領域中，除了編輯學，採訪學，通訊學，報業管理學，新聞評論學等等以外，還有新聞史也是極重要的一部份。因爲史學是社會科學的基礎，新聞科學既然要站穩科學的根基，自然應有「新聞史」這一項。新聞史的研究，不僅是要瞭解過去，將過去的事實弄得清清楚楚；尤其要發現未來，將未來的進步的趨向，探索得明明白白。這種「瞭解過去」與「發現未來」的工作，正是歷史科學根本任務。

新聞科學是一種「活」的學問，因爲新聞紙是輿論的時代同其脚步的，惟其與輿論的時代同其脚步，所以它本身也充分反映了「活」的特色。新聞的有兩大忌：一忌不進步，二忌不閉通。要進步，要閉通，便不能把新聞學看作死學問，把新聞紙看作死書本。我們研究新聞事業歷史，當然不能局限於新聞的業務，也應廣包新聞的學術與報紙有關的社會與政治的環境。唯其如此，纔能够追尋到新聞事業發展的信史；也唯其如此，纔能够發現新聞事業前途的光明。

因此，我們對於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並不是要從汗牛充棟的新聞史書中認定何謂新聞事業，或把這些新聞史當作年譜來背誦；更重要的却是要在新聞事業史中探尋，認識，並鑑別新聞史的方法，開拓并創造新聞史的方法。唯有這個方法，纔是使新聞史的研究有「活」的功用，使新聞學因新聞事業史的研究而獲得合理的進展。

研究新聞事業史的方法同研究普通歷史一樣，先要有一個「歷史觀」

，亦即是对歷史的看法。有了這個歷史觀，然後使歷史學成爲歷史科學。也就是說從歷史觀出發，可以明察歷史進化的動力，可以探索歷史進化的法則，可以知道歷史的任務在那裏。現在我們研究新聞事業史，也應該有一個對新聞事業史的看法，也就是我們要明白的新聞史觀。

(一) 何謂新聞紙

現在我們要對「新聞紙」一詞下一定義。什麼叫做「新聞紙」？新聞紙在西洋稱爲「Journal」，或稱「Neros Paper」，或稱「Press」。要知道新聞紙是什麼，不妨先說什麼不是新聞紙。比如參考書教科書不是新聞紙，廣告招貼不是新聞紙，通訊社稿不是新聞紙，新聞紙有其特有的條件，具備這些條件，纔能够被稱爲新聞紙。

過去曾有不少的人替新聞紙下定義：吉文說：「新聞是輿論的製造者與新聞的記錄者」。薩魯門說：「新聞紙是機械複製的定期刊物，將一般有興味的時事狀態的混雜內容，演成通俗的揭載物」般洛克說：「新聞紙是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出版物，以報告新聞和提供意見的」。這兩個解說，指陳新聞紙有刊載新聞和發表言論的作用，當然不會說明新聞紙的全部。威廉說：「新聞家者主紀錄，辨申訴，買賣新聞，判斷訟詞，保障民權，任指導又任釋疑的東西。若專事紀錄，不過是鈔胥，專買賣，就成釋版，嚴格而論，新聞事業，並非營業，而是職業，是解釋疑義的職業」。又說：「新聞事業是指揮管理主編編一報章，一雜誌，或別種定期出版」。這一說又增加了「保障民權」「職業的解釋疑義」等條件。若依我國報紙條例說：「用機器或印板，及其他化學材料印刷之文字圖畫，以一定名稱繼續發行者，均爲報紙」。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佈的「出版法」說：「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間，繼續發行者爲新聞紙」。這裏提出的是報紙的形式條件。然而這些都不是一個完善的定義。

從事實觀察，報紙有日報，午報，晚報，三日刊，週報等，它內容以

有要聞，電訊，評論，副刊，通訊，特寫，專論，廣告等欄，它必須是以迅速的方法，傳遞到廣大的讀者之前。

更加重要的，不僅應具備這些形式的條件，還要有新聞紙的其性格，為人們所熟知的，新聞紙是「民衆的喉舌」，可見新聞紙要說出多數民衆所要說的話，表達民衆所要表達的意見。在近代國際間掀起了如潮的「新聞自由運動」，新聞自由是使新聞紙獲得良好特性的條件，我們可以說沒有新聞自由的新聞紙，是不具備良好新聞紙應具的條件的。

根據上述兩項觀點，我們對新聞紙下一定義說：

以公衆的立場，自由的形式，用迅速準確而普遍的方法，報道新聞，指導人羣的印刷物，就是新聞紙。

在這裏，我們將評論，新聞，編輯，通訊，印刷，發行等業務全部包括在內，同時使新聞紙靈魂健全，而效能宏大的作用，也成為它必備的條件之一。所以說以上的定義是兼備了新聞紙的本質與現象兩個方面；同時這裏還有一個較大的意義，便是用這個定義，不僅說明了新聞紙過去的演進程序，也指示了新聞紙未來發展的趨向。

根據新聞紙的定義，引出了對於新聞史的認識。詳細地說：新聞事業史就是明瞭並研究新聞紙的新聞。採訪與傳遞，如何由不自由而迅速不準確而演進到自由，迅速準確，新聞紙的評論如何由不自由而演進到公正自由；新聞紙的發行，如何由不普遍不迅速而演進到普遍迅速的問題。

(二) 新聞紙進化的一般歷程

新聞事業史的書寫，如果一定要裝點門楣，如日本人的見解說自有人類即有新聞事業，未免太誇張，不切實際。我們可以這樣說：「新聞事業史在最近以前，僅是寫出如何產生一張真正的新聞紙，而從今以後，纔是寫它本身的效能和發展。這理由在中國尤其顯明，真確。而且我們可以這樣說：目前我們中國是否已經產生一張真正的新聞紙，還是個頗為值得研究的問題。」

正式新聞紙在世界上出現的，是十七世紀的「手寫新聞」，在中國首先出現而具有現代新聞紙形態的，是在一八一五年，到現在不過八十年，但這些新聞紙僅具備新聞紙的若干條件，而並非已有完形，所以我們要知

道過去的新聞事業史，是由歷史產生新聞事業史，從經緯萬緒的歷史中，漸漸產生形成一份真正新聞紙的條件，如造紙術，印刷術，文字，通訊術，採訪術，以及編輯學評論學的演進，和倫理，政治，經濟，文教，科學的發展，賦予新聞紙以內容，也樹立了新聞紙的獨特精神，新聞紙吸取了這些來自整個歷史的各種條件，纔形成了健全的新聞事業史，也纔有健全完備的新聞紙。所以我們說過去的新聞事業史，是附麗在其他歷史之中，它祇是「被動的」，新聞紙本身沒有「能動的」力量，也就是根本沒有獨立的機遇。

在研究中國新聞事業史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指出中國的新聞事業並不像歐美各國一樣，先有出版報紙的物質條件和政治民主的環境，然後報紙有了真實基礎以至逐漸發展；我們中國的新聞事業，自始即缺乏基礎，迄今仍如空中樓閣，非常危險，中國全國的報紙總銷數每日合計不過二百萬份，不抵英美一家報紙的銷數，報紙尚停留在為少數人的專利品，或文化上的點綴品的階段，所以從「春秋」「邸報」「京報」「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中外新聞」「申報」以至「大公報」「中央日報」等，這中間的演進，並無一貫的層次，忽盛忽衰，忽榮忽辱，我們不能用新聞事業發展的一般程序來解釋它。

(三) 新聞紙的原始形態

常聞道新聞紙是「人民的喉舌」，但這句話並非說明一個事實，而是提出的一個理想。新聞紙的起源，多是由君主私家的漸漸觸及臣民，這一趨向在中國特別明顯。喜歡自誇的人說中國自三代即有「新聞記者」。因夏書說：「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劉向與楊雄書亦說：「三代周秦軒車使首，週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兒語歌戲」。中國是最先有報紙的國家，「春秋」便是最早的報紙。因為春秋經解後序說：「王荆公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竟以此比附「春秋」作為「報」了，這是可笑的曲解。

一般承認的中國報紙的最早形態是漢唐的「邸報」，曾任燕京大學新聞系教授的白瑞登說：邸報始於漢代，約在紀元前一百四十年左右，那時候是寫在竹簡或木片上的，內載朝廷上的紀錄分送到各官員處去」。明崇禎十一年，邸報始用活字排印。顧亭林與公贖劄書：「憶昔時邸報，至

「張讀十一年方有活版」。後來各省駐京官邸也將朝中大事印成邸報，轉傳各省，以通消息，於是有「府抄」「邸抄」等不同的官報，將中央政府的政令傳達於各級機關，各級機關也還傳達於下級機關。沿襲到現在，就是各級政府的「公報」。也有一種直接傳達於民間的叫做「聖諭廣訓」，這等於現在報紙上所刊載的「告民衆書」。以上所舉「府抄」「邸抄」「聖諭廣訓」等，是最早具有新聞紙形態的東西。也是新聞紙在具象化中的歷程。無疑地，歷史在發展，促成了新聞事業史的發展，然而新聞紙所應具有的條件，並非很早容易就具備的。

新聞紙進化的歷程，應該是從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物質條件的提供。印刷，造紙，通訊等技術的發達史，是新聞事業發展的第一個憑藉。

第二：精神條件的進步。政治的思想的學術發展，是使新聞事業踏上自己的大路的第二個憑藉。

(四) 一個不良的傳統

我們更不能不指出中國新聞事業有着脫離羣衆，脫離現實的傳統。中國的報紙，以全國各地合計，每日發行總數不足一百萬份，分配給四萬萬人看，是四百人看一份報，比之美國每三人看一份報，英國每二人看一份報的情形，落後太甚，由此看中國的報紙，事實上並不與大多數國民關聯起來的，而是一種爲少數知識份子獨享的專利品，從道人訪問，以至邸報，也只是供給一人以至少數官員而已，報紙無緣接觸到人民，這已是報紙最大的危機。同時，由於報紙不與多數人關聯，它的內容方面也竟是僅能爲點綴品的形式，却並沒有普遍化的性能，文字的非多數民衆所認識，固不必論，內容方面也常與人民實際生活隔絕，報紙幅面上，最佔重要的是政治新聞，那些深奧的議論和人民生活沒有直接影響的新聞，至於與人民生活直接有關的如市政，衛生，交通，治安等等，反而不予重視，中國報紙似乎供給少數從事政治生涯的讀物，不是社會大衆的精神食糧。

如果報人不能開拓視野，永遠把這個壞的傳統保持下去，我們的報紙，將永遠是文化的點綴品，不能成爲社會各階層所必需的報紙，也就是永遠不能把報紙發行數字由幾萬份增加至幾百萬份。也就是中國新聞事業史將永遠停留在黯然無光的階段。

(五) 雙重桎梏

現代形式的新聞紙，並非中國國粹，而是歐美日本新聞事業的影響，我們雖然學得了怎樣做報，但並沒有這些做報的環境條件，原因是中國工業的落後，以及政治欠開明，這樣雙重桎梏之下，決定了中國報業的可悲命運，第一是印刷機器材料的缺乏，使報紙榮枯操於工業先進國家之手；第二是報紙不能貫徹職業的神聖使命，永遠逃不出政治的權威者之巨靈掌。前者的原因，到今天（勝利後二年半）上海的報紙爲了缺乏紙張而喊「救命」；後者的原因，寫成了中國新聞事業史上血盟的紀錄。

直到今天爲止，新聞事業在國內還不會取得它應享的地位，也就是說新聞事業還沒有寫下它自己的歷史。新聞事業史受着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歷史支配，報紙「開天窗」，報人殉難，報館封門，以及缺乏機器，缺乏材料的困窘，史不絕書，這種種事實，都可以說明報紙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迄無獨立的可能。還有一件事實是報紙雖應爲民衆喉舌，但報紙的經營出版，規模宏大，絕非一般民衆的財力所能担負，反之，它却常被操縱在政治的野心家，或經濟的壟斷者之手，造成了報紙任務的反淘汰作用。他們掏錢，收買，指使，報紙的發行人，編輯人，撰稿人，其竟少有辦法自持堅貞的人格，他們甚或做成了「寄生蟲」，他們不能憑民衆的要求爲辦報的宗旨，作立言的方針，而要看這些野心家的老闆們意向如何，這種報紙根本談不到「爲民喉舌」，也根本談不到「新聞自由」，也就是根本不配稱爲具有完備條件的真正報紙。這就是血腥的紀錄，真正報紙的產生，不知經歷若干奮鬥犧牲的場面，猶如中國正義勝利的獲得，是付出了八年血戰的代價一般。

美國名記者李普曼說：「現代報業的危機就是民主政治的危機」。報紙的繁榮，絕不能夠凌空而生，也就是絕不能在反民主的政治基礎之上，繁榮滋長現代的新聞事業，中國新聞事業從清代到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以至抗戰八年，政治民主的理想，始終接觸不到新聞界身上，再加以國內工業的落後，一切報業所需的物質條件的缺乏，猶如兩副鎖鍊，桎梏着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

(六) 惡果的滋生

曲折而血腥的新聞前史，寫下許多不愉快的回憶，這些不愉快的回憶

，一半固然是由於外力所加，無與新聞事業本身，但也有半，却由於報業本身弱點的關係。

報紙御用的結果，報人失去自信，新聞事業職業精神被僱傭關係所玷污，無由保持其神聖純潔，甚至作成了野心家的工具資本家的奴婢，以為亂真，暫非成是，言不由衷，談不上所謂「輿論」，而祇是一種可憐的「應聲蟲」，不是覺世誘民的「雄雞」，而好似勉為人語的「鸚鵡」。報人人格墮落，賣身投靠，是一種可怕的结果，既然賣身投靠，不妨再欺詐人民，新聞記者在報業前史中有一種極不光彩的稱號。叫做「報痞子」，敲竹槓，攻訐陰私，流品甚賤，總之，報人人格墮落與報業附庸地位的事實，是互為因果的。

以上的事實，在中國特別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經歷，我們的報人，直到現在，還多着不能不把報人職業精神放在一邊，而去曲從報紙發行人的

一己意願，這樣的事情，很足以滯留報業進化的脚步，給中國報業的發展橫生許多阻力。

無可否認的，中國政治民主化的迂緩與經濟工業化的牛步，兩者同樣賦予新聞事業以逆境，而且這種逆境的曲折與延長，也正是中國新聞事業史特有的現象。

然而，歷史進化的車輪，是必然向前的，任何人不能阻遏的。報紙所有的桎梏必有掙脫的一天，報業前史必有終止的一天。新聞自由的浪潮，捲到了中國，新聞自由終究是要實現的。抗戰勝利以後，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政府宣佈撤銷新聞檢查，雖然不能毫無疵議地實行了新聞自由，但新聞自由的尺度，的確向着放寬處演變。所可惜的是國內政局的不能安定，和平秩序的難於恢復，「新聞自由」也作着試探性的徘徊却顧，而且可能中途夭折的危險。

從歷史觀點縱談中國之治與亂

· 黃河清 ·

(一) 走筆話興亡

看三國演義，劈頭確定一個歷史，演變的大前提，便是：「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分與合的形勢，很顯明的代表着治與亂的局面？分別為割據，為偏安，為亂世，兵革擾攘，神州鼎沸。合則為一統，為昇平，為治世，縱馬山陽，牧牛桃林，河清海晏。五千年來，興亡代謝，法亂相循，二十四史中，已具體顯示，治難而少，(一)統一之局，不過八代，曰：周、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二)亂易而多，偏安之治，則十有二代。曰：東周後漢三國，東晉，宋齊梁陳五代，南宋。在此悠悠久史蹟中，起伏不定的政局，治與亂的因素，

不外兩種，一為外患，一為內憂。歷史家用不同的眼光，從各種角度去領會判斷，獲得了結論亦自不一。其一，是把治亂興亡的動轉歸諸「天命」，所謂「氣數」，託此聖人與神權，以釋史疑。如西漢王莽之篡位，東漢光武之中興，無不以「織緯」神說，以繼大統而範人心。其一，是「革命說」，仰繼湯武革命之口號，為民除暴，以成英雄之業。此二說者，實為中國政治史轉易權柄，歷代遞治之實據。但天命也罷，革命也罷，攫取政權的方式儘不同，造成的歷史結局則殊無二。「成者為王，敗則為寇」，所謂「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政治野心家，以命運為賭注。這是歷代權臣所以覬覦帝位，草寇所以揭竿作難的最大原因。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都是

馬上定天下的帝王，他們果實天賦不凡，而有撥亂反治的本領麼？他們不過是一輩草寇中的幸運兒而已。及其成功，便是創造歷史的英雄。便託以什麼「德」王天下，而以天命真命的面孔，愚弄百姓。由今觀昔，歷史上實在少見真的革命，真英雄。祇有歷史末葉，統治力式微時代，雄中之雄起而倡亂，掃滅羣寇以就大統，而撥用聖人與天命以自飾。所謂「君王」大位之爭奪，與亡之局，自古內幕，罔不齟齬。

(二) 治亂各有因

在中國歷史上，足以確定治亂政局的因素，依我們的蠡測厥有二端。一為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一為賢人當道與宵小弄權，遠者不論，試以

漢之七國之亂，晉之八王之亂，不封功臣而封宗室。政權下移，中樞勢削。往往造成「尾大不掉」之惡果。而篡奪橫生。當開創之時，汗馬奇功，成功之後，則免死狗烹。歷代君主，常以得帝位大殺功臣。啓權奸倖進之漸，重用外戚等官官。所謂「皇親國舅」，雞犬升天，左右朝政，權傾中外的史實。也絕少善政與良果可言。

本來，在過去專制傳統的政治中，官僚政治乃其唯一特徵。官僚所冀求者，無非權，勢，錢三個目標。爭權，趨勢，貪污，互相角逐。偶有特立獨行之士出現，遇到勵精圖治之主，則正氣壓服邪道，而國以治，可惜守業子孫，多將創業危難置之腦後。既遠賢而近讒，復淫逸與苟安。所以歷代末葉，昏君權奸相繼以來。官僚的腐蝕，奸雄的跳梁，遂致天下大亂。這彷彿成了歷史演進宿命軌跡。

(三) 痛悟猶未晚



對日和會的基本原則

對日和會之遲遲不能召開，證據最近倫敦四外長會議的失敗，以及中美蘇意見的分歧，我們覺得這個關係遠東和平，特別決定着中國未來安全的和約，其前途實在不易達到如期的希望。在本質上說，對日和約與對德奧和約同樣都包括着廢除軍備，賠償，和如何消滅法西斯以便保證世界永久和平的問題。這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基本

古代的宦官外戚宗室與近代的豪紳地主權門大戶是屬性相同的構成官僚政治統治階級的細胞。在這種政治形態下，治是象徵平民的低頭，亂是反映治的極點。便是說，政治如果全爲了統治階級的福利，那種政治絕不合理。當然受一般平民的唾棄而有以反抗，僞君子，僞聖人的統治，還不如真盜真匪徒的革命。因此官僚政治的末路，只好聽命於匪寇的擺佈。所謂「要息亂，賊殺賊」，在平民雪亮的眼睛中，治極必亂，治亂與平民都是一樣。

要謀真正的「治」而永杜「亂」源，在官僚政治中，事實證明，絕無可能。只有使真的「民治」，真的「治人」當路代替官僚政治才有希望。古人云：「民爲邦本」，西諺曰：「官吏爲人民之公僕」。由人民主政，由賢人執政，掃除「私」弊與「污」穢，千萬人都能呼吸平等自由的空氣，享受福利，盡其義務？個人胸無塊壘，社

會財無貧富，這樣政治可謂「清明」，人生得平，何必倡亂。老子之「無爲」，禮運之「大同」，殊途同歸，不外「平」而又「公」而已。

今也，海內騷然，你也民主，我也革命，正如曹操讓縣自明書中所說：「當世設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固然是自命爲「聖人」之徒各隨懷抱。但他們所乘的弱點總有作「亂」的起因。我們不敢妄以今代比擬任何前朝，只覺本身大病不治。無以應敵。所謂「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有政治雅量與眼光的政治家，逢到盜寇遍野，應先說「朕躬有罪」。明懷宗即使亡國，而其罪已的精神是可佩服的。今日之局，誠屬空前，外患暫除，內憂正殷。是分是合，或治或亂，繫於一念，但願識者有以痛悟，則國家之「治」仍猶易如反手也。邦人君子。揭起圖之。

一月六日南京。

· 黎 玄 ·

原則，除非美國有意也在遠東建立一個反共產主義的緩衝國，那麼它無論在技術上，或是在國際政治的現實性上，都將較歐洲來得簡單，同時，因爲中國的態度與中國易爲人所信任的民族性，我們不但有權領導這一和會，而且也必然地會促成完滿的結果，在遠東奠下一塊穩定的基石。現在，問題是於在中國政府的基本態度，它

的動機是否比較單純，是否出於自發的，也就是說，當未來提出具體的內容時，我們是否又把共產主義的問題放在心裏，以致對蘇聯若即若離；我們是否永遠把美援當做一個最高的目的，而在到達某程度時又遷就了美國。假使答覆是「否」字，那麼中國就有了正確而堅定的立場，可以在不斷的折衝中達到目的，不然的話，我們目前的

方案雖然大體上是接近蘇聯，但它將是屬於偶然的吻合，結果必至孤立無援而終於走上失敗的道路。

筆者不能認為中國的政府現在並沒有上面的兩種動機存在：三億元或比三億元更多的美援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它可以說是正中政府「戡亂」的下懷；中國對蘇一向的態度，無庸說是對共黨的態度，也將使我們「不敢」爭取蘇聯的協助；還有，中國政府本身基本的制度，更不喜歡在未來的日本實行土地改革與經濟民主化這一套辦法，而土地改革又為實現日本民主政治的不二法門。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賠款數額的多寡，商船噸位的高低等都是次要的問題。不過，政府的動機是否有這樣純潔呢？看來似乎並不能令人樂觀。因此，當我們討論與貢獻對日和會的意見時，也只好暫時依據於一個希望和假定了。

對日和會的第一步是有關於程序的問題，其中自然包括着最主要的否決權的保留問題。去年七月間，美國政府建議邀請遠東十一國在美舉行對日和約初步會議，採取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制；英國對此完全表示同意；蘇聯方面則主張由中英美英蘇四國外長會議起草對日和約，而須四國一致始能成立決議中國跟着就提出折衷方案，主張由遠東委員會十一個會員國組成對日和約預備會議，採取多數表決，但須包括中美英蘇四國之同意票。準此三種主張看來，實際上只有美蘇的取

消否決權與保留否決權的爭論罷了。中國的折衷方案，雖然言之成理但至少在立場上，我們認為政府已經開始軟化了，因為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顯然是兩面都不討好的。中國的態度倘若對於這樣重要的問題，習慣地走上中立之路，那麼蘇聯就將因孤立，而憤然地促使和會終無成功的可能，難怪澳洲外長伊瓦特曾這樣地說過：「中美的意見雖然距離甚遠，無法協調，但美國相信中國終必讓步」。所以，為保證這次和會不至步上倫敦四外長會議的後塵計，我們應當乾脆而明確地採取蘇聯的主張，以對抗英美三分之二多數的集團，「強國一致」的原則，在聯合國機構以往若干重大國際會議中，均曾採取此制，現在當處理日本問題時，若偏偏取消否決權，那是不公道的；尤其對於最有利害關係的中國，簡直是一種極其鉅大的傷害。所以從性質上論究，四國與十一國的分別，關係並不大，而否決權問題才是極其重要的。要是政府不會因循地把這次的外交變成具文，那麼，他們也許不至再以「事實的困難」來掩護完成其另外不可告人的目的。

當政府的立場表示得堅決而且公正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和約內容的主要原則：

第一點關係於未來四強對日合作的問題，就是如何組織一個合理的管制機構。去年英國在堪培拉會議中，建議組織一個盟國管制委員會，以代替麥克阿瑟元帥總部，這在大體上是沒有什麼

問題的：此外我們尤其要格外注意的，就是以後對日的管制機構，無論在法律的精確或實際的執行上，萬不能再由美國單獨主持，至少應由中美英蘇四強來共同組織，共同管理。因為依過去兩年間盟國管制日本的政策而言，可說是袒護放縱，使得日本的法西斯軍閥主義，仍舊不能消滅，將來或許還要死灰復燃，如果對日管制機構不重新改造，則一切和約中的規定，將完全等於無效。實言之，四強應當切實遵照波茨坦的規定，並讓中蘇有同等的權利對日本加以有效的管制，中國對日作戰最久，犧牲最大，兩年已經放棄責任，以後千萬應當負起責任來糾正過去的錯誤。

在未來日本的民主制度裏，天皇是象徵着淪落和反動的階級。保持天皇的制度（這在日本的新憲法中還規定着），不管就是延續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根苗，它不但對日本自身的民主化是一個絕大的障礙，尤其對中國將來也是一個無窮的威脅。波茨坦宣言中有一項是：「永久廢除所有欺騙及誤領日本人民從事於征服世界計劃之人的政權及勢力」，由此看來，中國可以不顧美國的反對，堅持要求取消日本天皇制度的意見，同時，他將以普通罪犯的身份，予以最嚴格的法律的制裁，特別對於東條之流，尤其不允許像美國現在那樣的姑息。我們處理日本的問題，應當本着「行法嚴，立法恕」的態度，因為唯有這樣，才可以一面使日人心服，一面又可以收到斬草除根之效。

和約中最能具有長遠計劃的，還是日本再教育問題。麥克阿瑟元帥雖然對於這個未來的日

本教育制度，並不能說有關心。一九四六年中，美國赴日教育考察團，詳細研究日本教育制度之後，對於未來的改革，會擬定全盤的計劃，例如訓練教師，選擇課本，改良「假名」文字，刪除歷史神話，以及實施公民教育，開辦高等教育機會，消滅文省都權力等等，都有細密的規定。不過，以西方人的眼光，觀察東方人的性格，總有些隔膜，尤其是日本人的國民性，向來長於虛偽掩飾，更不易窺破其底蘊，所以美國調查團只能做到理論方面，而沒有真正地切合於事實。

因此，在未來的管制機構中，中國應當特別側重於如何監督與教育日本人民的問題。我們一方面固然要扶持日本走上民主的大道，另一方面還須防止黷武思想再抬頭，和根除所謂「八紘一宇」的謬論。為着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自非澈底監督他們的文教機構不可，其監督方法，應當設立一樣特別的管理機關，對於他們的學校課程和教科書，以及一切出版物上的文字，都應該加以嚴厲的檢查，否則，日本人民的武士道精神一

且尚未消滅，則任何其他的管制或處罰都將無能為力了。

第四點關於如何消滅日本用以重行侵略的經濟潛力問題，中國必須把眼光放得遠一點，這也就是說，千萬不要斤斤計較於賠償數額的多寡或機器的種類，因為，這容易被美國所滿足而上了他們的當。未來的日本必須從他們幾個財閥的手中剷除其經濟特權和土地的封建統制，這樣，日本的軍國基礎才可以消滅。現在美國的華爾街財團要把日本變成「亞洲工廠」的計劃，對於遠東各國的和平發展，已構成了一種反動性的危險，他們正在作一切的努力去維護舊有的階級，並企圖建立一個「穩定而繁榮的日本」，給予她在遠東的經濟勢力範圍，好使美國從中獲取大部份的利潤。如果日本真的得恢復其在東亞多年的經濟擴張，則中國、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都將再受變襲，而蘇聯在遠東採取積極性的就非常的需要了。

我們知道蘇聯在對日和會中也許會作多少的

讓步，但她對於主義與經濟利益絕不會有所退讓，尤其關於日本未來的經濟制度，如果易於促使其法西斯主義的動員，則蘇聯的合作將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報紙大部贊同這一點，並積極支持蘇聯的建議，即召集會確保對軍國主義的日本取得勝利四強會議。以便籌備和約，同時還要澈底地對日本的經濟予以改造，以免她的侵略潛力的復活。

在未來的和會中，中國所必須爭取的地方自然很多，不過，我們應當明白什麼是基本的和長久之計的問題，否則，我們便不能達到集中目標與堅持到底的成效。我們對於物質的要求，如賠款，領土等都無妨寬點，管制的年限也不必硬性的規定二十年或三十年，以保留伸縮的餘地。中國的對日外交，向來是害着短視病的。這一次的勝利可以說是一個絕好翻身的機會，我們應當要有一個具着遠見的「獨立」與「自主」的外交政策給國家的前途謀安全，千萬不可再做美國的應聲虫。我們希政府與民間都能一致嚴肅地注意這個關係中國整個命運的大問題。

自由主義怎樣了

· 呂拙文 ·

馬歇爾離華聲明發表一年來，中國的政局是愈趨低調了。不健忘的朋友應該記得：在那篇聲明中，馬帥於分析和平談判調解失敗之後，曾特別捧出自由主義者，希望們他能設「居於領導地位，採取實際步驟，以實施中國最近通商之民主憲法」。時流真快，轉眼一年，在這一年中，美國人不能說不熱心，黨派不分民主與共和，自杜魯門、馬歇爾，以至塔虎脫。

杜威，提到淺華，或多或少，總要涉及擴大國民政府，延攬自由份子。程度容有輕重，用心則朝敵野一致。美國的輿論表現得更起勁，從左到右，縱然罵得再兇，大多數還是主張美國人掏腰包幫忙的。但說來奇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年來所遭受的命運，事實證明是每况愈下了；唱相反調子的報刊復勒令停刊，不甘願一鼻孔出氣的政團宣佈為非法。我無意

片面責備政府，在另一面由中共所代表的極左派，對自由主義者也寬容不了多少，老實說，今日的中國，自由區固然並不如何自由，解放區又何嘗真正解放。講這些話，跡近牢騷，於事無補，徒遭人忌。然而這實在不是一個偶然的問題，在一連串與自由背道而馳的事實後面，隱然有着自以為是的理論作支持。揭穿它，說的它，在今天的確是十分必要了。

二十年來的史實告訴我們，政府當局對於自由主義者的態度。表面一套，事實一套；口頭上時而抨擊時而溫和，而手段則萬變不離其宗，一貫地採取壓抑政策。在這點上，我頗以為中共的行動乾脆，他們在理論上誅謫自由主義。在行動上偶而也顧到策略的需要免不掉利用自由主義者，但存心則無談好的心理基礎，準備應時一脚踢開，而且小心翼翼，猶恐自由主義軟化了黨的力量，隨時都抱着和自由主義者拆夥的打算。比較言之，中共對自由主義的態度是明快犀利得多了。所以就事實而論，極右派和極左派的政治利害誠然南轅北轍，其對自由主義的看法却是一致的：看不慣，討厭，滾作媽的。換言之，自由主義在今日中國所交的惡運，真罪過是屬於左右雙方的。我們不要忘記：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生死冤家，但對付自由主義却似親家式的，兩頭一致攻擊。

中國的情形，自然不盡同於外邦。今日當權的國民黨之對付自由主義，理論上是根據三民主義的。就順應潮流適合國情言，三民主義的進步性是國人所承認的。不過一種理論或學說的建立，求其完整而無懈可擊原屬奢望。所貴者端在後人的損益補充。譬如儒家，在為中國建立一個不衰的學派上，其功績是不可抹煞的，但儒家的思想主張，不管其原意如何，為人曲解為野心家所利用之處即屢見不鮮。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始意在指明做皇帝像皇帝，為大臣者像大臣，翻成現代語應該是各守本分，各盡其責，但這句說幾千年來竟成了專制皇帝苛責臣民盡忠的教條；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初衷或不欲主張愚民政策，（此點梁任公、郭沫若已先見，詳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章民權問題。郭著：十批判書孔墨的批判）但竟被後來的野心政客作為「牧民」的「經典」。再如博愛如耶穌，其內容是主張人家打你的左頰把右頰迎上去的，孰料教會會利用他，中世紀竟成黑暗時代。出名的異端裁判所，真不知彈送了多少無名冤鬼。在這點上，三民主義何能例外，三十年來宣傳的積累，在多

數國人的心目中，三民主義不啻是一部二十世紀的經典。國民黨懂得宣傳，自然會挖空心思運用三民主義為退進的武器，他們從民權主義裏找出中山先生批評代議政體的話，旁敲側出地反對歐美的民主政治。本來自由主義必然表現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廣大民衆的國家勢必為代議政體，表面觀之這樣的批評自是很得計的。殊不知中山先生對代議制度的看法，是立足於革命的全程之上。中山先生乃一革命家，革命家的理想常是矚目於事實上層的，以先生光輝無瑕的人格，指摘代議政體無不適當。但作為一個政治家，特別是今日掌握實際政權的袞袞諸公就不配這樣講。為什麼？政治家講實際，求政績，今天的中國政治，民主的氣息都顯得淡薄。還奢言什麼直接的全民的民主。我常言膏藥雖靈，治不好病一樣不值錢。由是以觀，拿不相干的美麗的遠景，作為當前政治漆黑一片的搪塞，美麗固然美麗，但其為好看而中用的月亮，有何意義？這幾年來，社會主義成了思想界的慧星，於是相對的民生主義亦大走紅運。民生主義我全然贊成，反資本（淘汰資本家）反封建（銷滅地主）應是民生主義的兩大骨幹，民生主義最反對資本制度，中山先生不止一次地抨擊資本主義。何如事實的表現，中山先生又倒了霉，他老人家的主張，被豪門權貴作為擴大既得利益的張本，美其名曰：「發達國家資本」，被用來箝制民間自由經營的藉口，說是「抑制私人資本」。我深信中山先生有知，一定會大聲叫屈。這是三民主義的不幸，自然更是自由主義的悲哀。

然而，自由主義的劫運並不至此，在極右派全力攻擊之下，極左派從未片刻放鬆。老早就有人講過，在國民黨統治之下，自由還是多少的問題，如果中共執政的話，自由將是有無的問題。這因為國民黨之壓制自由主義，僅由於自由主義在利害上與握權的特殊階級兩不相容，其動機是偏利的，畢竟不好明目張胆地阻迫；而中共之反對自由主義，則在於馬列主義的根性上。稍稍涉略馬列思想的讀者，大概會喚起這末一個印象：即共產主義之與資本主義的誓不兩立。這次不是偶然的。在極左派的人士看來，資本制度係以自由競爭為基礎，這根根兒是自由主義的派生物。換言之，自由主義在經濟上表現為自由競爭的資本制度，在政治上表現為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在國際上則不可避免地走上帝國主義的血腥之路。在學理上他們指出亞當司密司的國富論以代表自由主義之經濟的一面；指出洛克

、盧梭的契約論以代表自由主義之政治的一面。在哲學上他仍找到邊派。這些人的思想學說直接間接促成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否可以一口咬定說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多為因果不可分離的一物？極左派的毛病實在太過，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罪惡，便以為與資本制度相應的民主制度，自由主義統統要不得，實質民主政治，自由主義之與資本制度原是一時因緣巧合，並無必然的誰隸屬誰的關係。我們反對資本主義的民主固可，揭穿資本制度的自由為「飢餓的自由」更對，但並自由民主而取消之否認之，則大可不必，且顯然「因廢廢食」了。因為自由主義民主政治並非資本制度的專利品，亦非其所派生，自由主義乃屬人類理性演進必然的表現，民主政治則為順應人類理性的結果。遠在古希臘時代，自由主義的星星之火即已燃起。詭辯學派的創始者蒲拉塔哥拉斯謂「人是可物的尺度」。喜底亞絲則直斥「法律是人類的暴君」。亞里士多德出名的政治三分法：君主政治，官頭政治，民主政治，至今為學者引用。中世紀被因為自由主義的黑暗時代。但學者如馬塞流猶斷言：「法律的主要而正當的來源，是人民全體」。這和後來十八世紀的自然主義者主張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是一脈相通的。

這裏必須着重指出的，自由主義並未停止在十八世紀的思想領域上，一如極左派所指摘，變為資本制度忠實的婢僕。本文，不願多作學理上的討論，此處祇需假借美國費邊社的台柱拉斯基，法國憲法學權威狄驥為代表。如所週知，費邊社是提倡溫和的社會主義的，他們重視社會主義，但從不輕視自由主義。論者且謂費邊社的設立主要的目的即在以緩和了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代替主張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這當然不是沒有根據之言。拉斯基最近曾因保守黨某技詆毀其為共產主義者，吃了一場莫須有的冤枉官司。結果雖敗訴，但其民主精神却已贏得舉世自由人士的同情。異於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他是主張逐漸消滅資本制度的。他在其名著「政治典範」中主張分財產為三類，第一類係為公眾所急需且含有獨占性質者，因其關係民生，其經濟應以使用為目的，不圖利為目的，拉氏主張國有；第二類非民生必需品，拉氏主張人其合作；第三類消耗品如香水之類，則認為可聽其自由發展。拉氏竭力主張實業的民主化，提倡工業人才制

度，其意則認為有錢的人不一定有經營實業的才能，殆欲取消資本家生來即是資本家的不合理現象。狄驥為「社會聯立關係」學說的建立者。他從社會事實的觀察立論，認為人類社會的成立與發展，賴乎分工合作的演進。益因人類一方面彼此有共同的需要，另一方面復有個別的需要，社會學者稱前者為「同求的聯立關係」，稱後者為「分工的聯立關係」。狄驥是反對自然主義學派的大師，他抨擊天賦人權說，但他對傳統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即十八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仍竭力加以維護，因為他把自由看做一種功德，認為促進「分工的聯立關係」所不可少的工具。換言之，自由愈充分，愈足以發揮人類個性的性德，對社會的進步必需有裨益，狄氏的解釋，打破了因襲的玄學觀念，從而也扭斷了自由主義與資本制度相聯的鎖鍊。因為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資本主義如此，社會主義亦然。若從一種角度言，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人類自由的擴張史，測度一個社會的進步與否，自由不失為一個最好的衡量器。學理的話只此打住。

總之，民主並不等於憲法，骨子裏的精髓無甯是自由主義。而且我深以為：憲法上對人權的保障，繫於人民對自由的覺醒。其關係是等比例的，設若憲法訂得十全十美，而憲法下的人民能生活於專制之下，或漠然於自由的深愛與尊重，則其結果不是有名無實，便是整個憲法的壽終正寢，歐戰後的德國威瑪憲法即為最好的證明。

在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的遭遇是够慘的。上述云云祇不過是粗枝大葉的訴述而已。今天的中國生存問題是第一，誰有如此勇氣，敢敢為自由而去掉飯碗，說不定言論自由未到手，作為言論之本的身體却已先喪失了自由！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還是作學識時務的叔孫通，說幾句違心之論的話，「明主在於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到那時也許可落得「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且非俊傑歟！這就是今日中國自由主義者一般的寫照。

我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看法

方建民

◆◆◆ 我們心目中的社會改造，不是用炸彈，暴力或政變，而是漸進的，很講智慧和科學的精神，用教育和民主，求其一步一步的實現。

——張君勱——

最近樊弘教授在觀察三卷第十八期發表：「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一文，從這篇文章中讀知樊先生政治主張早與梁漱溟張東蓀二先生有所討論了。可惜我對於樊先生以前所發表的大作均未拜讀，故未深刻了解樊先生整個政治理論的體系是怎樣？不過就今日這篇文章裏所提到的中國政治根本問題一點，在我看來並非根本，這是我與樊先生觀點不同之處。

樊先生說：「我覺着任何有益於大眾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其所以不能實行，多半不是由於這種理論缺乏哲學的根據，而是由於他們與特權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關於任何一種政治主張都有它的哲學根據的一點，當然使我很是相信的。惟其不能實行是否即由於「他們與特權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的結果？照樊先生的意思凡是某種操作權勢爲着私利設想的階級，無論屬於那一種美滿的政治主張達到這階級都是不能達到實現。當然這是一種最不良的腐化的政治現象；譬如中國權閥資本階級的存在，以致侵奪了國家經濟衰敗不堪，社會不能安甯及國家的前途暗示着種種使人愁悶的危機。但是權閥資本階級怎樣會發生侵害中國社會，我敢斷定的說法是法治精神不能實現，所以產生了爲私利造成的貧窮衰弱的腐化狀態。近十餘來的中國社會最主要象徵就是人情和命令支配了一切。法律不過是

件裝飾品，實際上是使用它不着的；譬如政府禁止化妝品或其他奢侈品不准進口，可是各都市中仍見到有這類東西充塞市場。你說某貪污的官吏犯了法律，在法律上應該處以嚴刑，事實上上峯可以運用命令解除他的一切罪跡，甚至還可以重新出來高升三階的職位來担任了。就是你做了黃金美鈔達了法律被官署捉去，你不必怕，祇要你看破了一些，多宴請幾個有關此項事件的主辦人員，送他們一些珍貴的東西，他們便會即刻下個命令對你認誤會說抱歉的。有一個從新嘉坡回來的華僑說：「在中國祇要有錢，什麼事情均可順利的進行」。真是一針見血名貴之言。如果中國人民和官吏都能守法，無論自上而下或由而上的行政行爲，均遵法律，以法律來統治一切，則任何一個階級是不會有爲私利事件發生。所以一種政治主張不能實行，並非由於「他們與特權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而是法治的精神不能實現的結果。

其次樊先生說：「假如說一個人的關於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言論，是極力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各階級聯合起來，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壓迫的階級。那麼，我便覺得這種主義大有實現的餘地。……假如說，一個人的主張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人不去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階層，或不主張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各階層，必須一齊聯合起來，推翻壓迫的階級。那麼，我便敢說，他的政治主張，無論說的如何好聽，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權的階級的統治地位，其結果一定是不能實現的」。讀過了這段話，頗對樊先生感到恐懼和害怕。吾人身處在這個偉大的民主的聲浪中，對於當前不講現實的政治狀態，已經進爲不流血的改革了，不必強硬運用殘酷的流血的暴動。譬如在今日英國工黨能用和平的政治手段推翻長期執政的保守黨就是一個顯明例子，英國怎樣運用和平的政治手段呢？首先使我們注意到「英國有一個善良的政治制度中有着避免革命的安全機構，那就是責任內閣制」。英國責任內閣制的特點，就是「政府必須向人民負責，執行人民大多數同意的政策，人民不同意，他們必須下台」，所以在英國當權執政的團體的更易完全根據人民意志而變動。中國今日的一切政制雖然未有英國上軌，但是人民普遍已經覺悟了對於民主的和平的需要非常迫切了，就是國共二黨亦都有這樣感覺。革命理論是國共二黨的東西，但是今日國共二黨各持革命建國的主張發生了當今殘酷的戰爭。如果大家都是愛好自由與和平，這個戰爭的悲劇是不會發生的。現在國共之間形勢演變至此地步，我們祇好俯從法令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怨恨流血的革命主張，正如痛罵殘酷的戰爭一樣，我反



美國與世界

· 沈立鈞譯 ·

對這種思想再侵入人民平靜的腦海中，我敢斷定說中國有無挽救就視人民對於這種革命理論是否發生興趣而決定。所以樊先生所提出的「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各階層，必須一齊聯合攔來，推翻壓迫的階級」的主張，實為吾人所不敢贊同的。號召集體革命暴動，不能爭取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國家的生存，且使國家陷於循環革命之中，造成如

法國革命的歷次恐怖與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殺人放火一樣悲慘狀態是大可不必的。
綜合上述，「不能守法」與「着重革命」都為當今中國政治兩大主要的問題。所以一般政論家大多主張中國早入憲政階段，希望以各黨同立國法之下，共同謀求解決種種艱難的問題，亦就是這個用意，楊幼炯先生說：「此如議會政治在

民國成立後的十年中，在我國也行之很久，但因人民對於政治訓練素養不深，民衆組織迄未健全；而政治腐敗，無一定的主張，以致政黨政治未能活用，結果造成了多年的政局混亂的狀態」。今日吾國憲法已經產生了，政府又決定本年為實施憲政開始的年份，為了今後政治免致重入腐敗故軌，而免再發生慘慘的鬥爭的悲劇，適從憲法的實施是非常必要的。

著者 Joseph P. Kennedy 曾任美國駐英大使，為現時美國外交方面實在論派的特出的代表人物。此文把他對於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是對於蘇聯——的意見披露出來，

從我看來，有兩種不同的基本的概念，美國必需從中選擇一種的。第一種概念是基於信心，用穩固而堅特的壓力以建設全世界自由的民主，這世界將來終於達到進步的文明狀態，將沒有戰爭和戰爭的恐懼。這可能看見的和平乃是進步的結果。
在理論方面這種概念不是沒有理智的，牠要利用所有的因素與勢力，以求得一更好的世界，吸引一班熱心誠實而樂觀的人做牠的贊助者。可是照我的意見，這個概念有三種概念的缺點。

第一個缺點存在事實裏面的就是這種性質的政策，必然包含美國在關心全世界別的民族的程序裏面，從前沒有嘗試過或鄭重的考慮過的。
第二個缺點是歷史指示我們，最進步的民族是參加戰爭次數最多的民族：希臘、羅馬、西班牙、法蘭西、英國、德國同美國等皆是。倘若全世界包含亞洲在內，得到和平的文明這和平的文明是可以被保證的，如上面所說的法國，在歷史裏面很少有這事實可以證明。

第三個最嚴重的缺點是倘若我們將落後的民族發展成功戰爭的民族，倘若大國變為侵略國，對於防止大戰爭，或是遇到大戰爭而要得到勝利，

在這計劃裏沒有設想到。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美國現時的政策。牠是不是把我們包含在關心全世界別的民族的事件的裏面？我斷言是「是的」。在希臘國內選舉情形的綜錯複雜，巴勒斯坦境內之種族的危機，巴爾幹半島，印度、西班牙、阿根廷理論的政治的衝突，以及「未獨立民族」的許多問題，都可做例子。在未來的大戰爭裏我們的政策有什麼保障嗎？我僅看見懦弱的事跡。當一個人靜觀民衆的需要如何，又缺乏堅強領袖控制此需要，在幾個月以前我們已從損毀我們的大量的軍用品，我們的希望還沒有光明，戰後的軍事政策，還沒有充分地堅強，足以保證對抗未來的戰爭。

不幸得很，聯合國的貢獻很小，又沒有反抗大戰爭的保證。安全理事會裏的大國否決權使安全理事會失其作用，成為對抗大國及其衛星國一事種工具。聯合國有防止小戰爭之可能，但不能防止大戰爭。

所以我們現在的世界政策，在仁慈的外貌之下來干涉全世界，有一種助長戰爭的危機，對抗未來的戰爭，並無適當的保證。這種概念是不成功的而且危險的。

代替牠的我有的一種實在的概念。事實上或許有另外一個世界戰爭在醞釀中，這一個戰爭將予世界進步以致命打擊。世界必需集中所有力量即使犧牲現在人類的進步，以防止未來的世界戰爭，牠的前提是倘若我們的進步是自動生長的，那末，簡言之是進步為和平之結果，來代替和平是進步之結果。

這個概念也是維持我們國家在這樣地位上的準備，倘若一個世界戰爭來到，這戰爭將要縮短，有決定性，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擊。倘若，我們的敵人侵略國復起，在將來也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兩種情形可能發生，即單獨的或聯合的起了世界戰爭。一方面美國的聲望與權力的降低，一方面三大國（指美蘇英）分裂。

美國並非真正降低地位。但是這種理想絕不是不實在的。我們完成這次戰爭，在歷史上成為最有權力的國家。現在怎樣呢？我們損毀大量軍備，負擔大量的公債，受通貨膨脹的威脅，工廠復員遲緩，我們的政治還是和平時一樣或者更壞些。這樣情勢我們就能維持我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嗎？恐適得其反。很清爽地說，我們不能夠維持的。倘若我們真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我們對於上面的建議，應當再責罰我們自己的身。

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二種的來源是三大國的分裂。因為事實上三國分裂可擴大成為大戰，蘇聯站在一邊，美國站在一邊，英國站在一邊，或是英美站在一邊，因為這個理由，我們對蘇的政策在我們的世界政策裏是最重要而最困難的一部分。這對蘇政策是性命攸關的重要，因為蘇聯是世界戰爭中最大的可能的來源。

現時蘇聯外交政策在國際關係中是最不確定的因素。除了美國之外，蘇聯要算第二個最大的白種人口最多的，擁有最大的未曾開發的資源，最有力量的軍隊，最有力量的政府，世界上事務也在政府範圍之內。邱吉爾會解說蘇聯的世界政策，說牠是「包在神祕的謎語中之謎語」。這神祕在事實裏是這樣蘇聯進行的理想政策與民族主義的政策，這兩個政策有時是矛盾的，有時是合併的。

蘇聯基本的理想政策，在於向全世界推行共產主義。在史太林統治之下當時蘇聯需要鞏固牠的地位成為統治世界二大國之一，蘇聯會從這種政策退却。史太林最近的宣言，及共產黨人在美國及拉丁美洲的行動是最顯

著的事實，無論如何這種政策未曾得到發展。

蘇聯基本的民族主義的政策，用普通的名詞來說明，正和別的民族一樣，維持土地的安全，求政治經濟社會福利之進步。為擁護她的民族主義的政策，蘇聯很明顯注意開展她的聲望與軍事力量。她偵察別的國家，利用別國任何弱點，為她策略的安全。她要有「友誼」的保護帶，就是她四周被統治的國家，製成一哨兵線衛生圈免得與資本主義世界太接近。又做共產主義推進的橋頭堡。

蘇聯實行這種政策已有很多的成功了，在中歐與巴爾幹方面增加了許多利益，在東北歐東南歐方面她正施壓力想控制韃靼尼爾海峽，包含了愛琴海根據地，並且干涉到非洲托管制的地方。在中東方面她正要求土耳其

徵古錄

徵明

蘇東坡被譏，親朋皆與絕交，道出廣陵。揚州知事鮮于侁獨往見，或勸其將與蘇平日往來文字書札盡焚之，鮮于曰：欺君欺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責我，則所願也。事見西園見錄。

今人勢盛則親朋慶集，勢敗則門可羅雀。且多落井下石，其涼薄有加。李卓敏宣告無罪，語人曰：此番事既大白，使社會認識本人，亦使本人認識社會。蓋慨乎言之。李案不具論。但一般社會，往往於任何一案偵查期間，不待知其有無確罪，即道路謠傳，鮮有人挺身而出為主張者，平日趨附之輩，一變而為舉訐之人，味法與無情，他國所罕見也。

改正東北的邊界線，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前她對伊朗已作堅強的自衛工作。

在東亞方面，蘇聯佔領了朝鮮北部，特別表示開拓領土與不合作態度，同在巴爾幹情形一樣，住在朝鮮的蘇聯人民比住在歐洲的好。但是他們在滿洲的態度很不好，沒收財產，延遲撤兵，預示他們的遠東政策可能引起與美國的亞洲政策直接的衝突。

對於聯合國之蘇聯政策也同此一樣，只要於蘇聯有利而無害。在安全理事會裏她的否決權保護她自己同她的衛星國。她尋覓進行交易的地位與機會，以擴張她的利益與勢力到她所未達到的範圍中。在蘇聯趕上美英兩國的工業與原子製造能力之前，聯合國應盡力從事於她的目標，以防止大

戰的發生。

蘇聯的一黨專政與比較的未蒙損害的軍事力量她的地位很適於她作威脅與活動。自信，侵略，殘忍在蘇聯是認為適當的行為標準不受束縛的。她準備攫取每個與她的反對者之弱點與錯誤。在普通談判裏蘇聯顯示有世界的威脅，其實她正製造最大的威脅。

這是很明顯的，美國應居領導地位，以解決這種局勢。

有一種事實，所有最了解蘇聯的人贊成的：蘇聯了解，希望，羨慕無文飾的，直接的，實行的，雖然粗魯的實在論，——在思想，言論行為各方面。她自己實行的，她希望別人也照樣實行，倘若別人未曾照樣實行，她就對他懷疑。一個民族沈浸在任何思想或行動中不完全基於自己的利益，這種觀念顯明地離開蘇聯的概念太遠，她認為這種民族不是愚蠢便是無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我們與蘇聯的關係受的苦痛很久，因為我們不了解她們的實在論的魔力而爭執。我們現在應當採實論做我們政策的基礎。讓我們坦率的誠懇的來研究可能的蘇聯政策，她的政策與美國的關係怎樣。我的意見，蘇聯政策從我們的觀點，應把他分做五組：

(一) 有些事情是我們不喜歡的，但是從實在論來講，這些事情我們還能記憶的。
例如：芬蘭、波羅的海沿岸諸國，比薩拉比亞，千島羣島以及德國佔領區許多地方。

(二) 有許多事情在原則上我們反對的，就是不合作的表示。但是不要再有這種事實發生。
例如：波蘭、東普魯士、朝鮮北部，共產黨活動的現階段以及關於聯合國困難態度。

(三) 有許多事情我們絕不贊成的，雖說不致引起軍事行動，但是造成實在的不合作。需要我們也有同樣的不合作，尤其是在那助經濟恢復方面。這一類的事實能予聯合國以重大損傷能使蘇聯從她分離。

例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伊朗、滿洲，等地緊張的共產黨的活動，不與聯合國合作，在已到了和平確定的時候或企圖控制原子能的時候。

(四) 有許多事情指示蘇聯政策的變更，從不合作主義到可能的

威脅——因此在我們方面需要確定行動，從聯合國機構裏逐出蘇聯。

例如：在蘇聯西方德國境內政治的軍事的推進。抵抗斯基的納維亞或非北的侵略行動。分裂聯合國行動，或蘇聯共同管制原子能之要求。

(五) 有許多事情超越了上條的範圍，對世界和平確實造成侵略與一大威脅的，結果需要戰爭。

例如：對於歐洲西海岸，英國、非列賓、西太平洋或西半球施行實際的威脅的攻擊。

美國基本的政策應防止世界第三次戰爭。利用這個政策做工具解決我們對蘇聯的困難，把美國造成世界上最强國家還是次要的。對於那個目標：

(一) 宣布美國考慮她與蘇聯的關係是一懸而未絕的防止世界戰爭的問題。

(二) 說明美國以後追隨明白的率真的清晰的實在論的政策為美國與蘇聯之關係。

(三) 通知蘇聯、美國想像有五種可能的地位，蘇聯政策假定對美國——正常的友誼與合作，有限的合作，不合作，可能的威脅，確實的侵略或侵略的威脅。

(四) 通知蘇聯在第一點情形裏美國是站在準備全部與蘇聯合作，以幫助蘇聯經濟之重建設。在第二點第三點情形裏，美國合作與幫助的程度，將看蘇聯合作的程度如何。在第四點情形裏，美國將採取最實在的方法，集中世界西方各國力量來反抗蘇聯。我們為維護國家安全與世界安全之地位，將不得不採取適當的行動。在第五點情形裏，我們要宣戰。

我們第一部工作是維持美國的原狀，對於這個目標：

我們應比較戰爭作更緊張有效的努力，使我們國內外的政治制度進步而有效。

我們必需確實使我們維持美國道德的經濟的，軍事的力量達到水準，保證倘若戰爭來臨，這戰爭為時很短，有決定性，對侵略者予以致命的打擊。

最後我們應當接受並了解的，世界領袖給予我們的責任，種類很新，範圍很新，倘若我們規避這些責任，我們就失掉那個領袖和他的和平進步的世界之最後希望。

中國歷史上之中樞制度

——中國政治制度史談之一（續）

· 杜 衡 ·

宋朝又沿唐末的習慣，以學士院為儲相之地。而學士院又為文學侍從之臣所蓄集之地。他們從進士出身的人挑選出來，又經過考試而取得這種清華內資望。於是漸漸變成明清兩朝非翰林不能入相的風氣。宋初的宰相，大半是進士高第，（狀元作宰相自宋以後幾乎成了定例）會試館職，與君主接近的人。他一定有豐富的文才，清素的品格，端凝的風度，以及通達體體的抱負。總而言之，是沒有野心而極可靠的文人。

宋初相傳說是不以南方人為宰相，而北方人在宰相之位的，如李昉李沆王且李迪王曾這班人，都講究持重持正，不顧多事，可以說是德過於才的。及至真宗以後，南方人漸漸顯出政治身手，而北方人常門不遇。大概南方人出身邊遠一點的地方，在實際政治之利弊知道得清楚，而情緒也較為急進。這就成為以范仲淹為急先鋒的新法運動。這個運動隨後在王安石手裏成熟了。

王安石所策動的改革，方面極多，是對於法制及社會組織教育思想整個加以革新。過去除王莽以外，尚未見有這樣大的規模。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先有一個條例司來製成各種的方案。他以宰執的地位，主持全盤計劃。（他先是參知政事後來正位首相。）因為改革的事項太多太急了，引起一般的言論攻擊。但他取得了神宗的信任以後，先後付諸施行，並不因空言的反對而退縮。他主持對西夏的國防，收復洮河，居中策劃，不因軍政兩方有隔閡而生阻力。他雖然為內外的攻擊（自己的黨羽也不和）而感苦惱，但終於奠定了新政的基礎，製備了新官制的方案，而後下野。他的潛泊肅靜超然榮利之懷，求事業之成，不求個人之把握權勢，令人復見諸葛之風。於此可見宋朝宰相的地位，是可以有為的，而且是可以得人的，換一句話來說，王安石這種人幸而在宋朝，在別的時代便更不容易有這樣從容的機會，能以坐在廟堂之上而施展其抱負了。

王安石所預備的新官制草案，叫做元豐新官制。其精神在正名實實。所有官名分為職事官寄祿官兩種。職事官奉行本職的職務，而寄祿官區別階級身分。關於中樞的組織，大約經過很費事的斟酌，而卒於採取折衷的

方法，沒有什麼急進的改革。仍舊是二府對立，而宰相則一個以中書侍郎兼尚書左僕射，一個以門下侍郎兼尚書右僕射，於是變成兩個宰相，各以三省長官（最高長官不設而以次官代長官）之資格裁決尚書省之政務。尚書省變成一個實質機關，包含無數部門，合署辦公，名為尚書都省。

但元豐官制並沒有變更唐宋相承的中樞制度，或許因宰相的員額減少而權力稍為加重一點。所以蔡京能以享有炙手可熱之權為唐宋多年所未曾有之權相。然而徽宗拿蔡京任免了幾次，今天高興以之為相，明天不高興就罷相了，並不覺得他的根柢牢固難以剷除。足見這時所謂權相，又已與魏晉的權相不同了。

南宋因為軍事的關係，想增加相權，索性正名為左右丞相。不過實質上並沒有人能發負責來担任國事，只覺中樞組織之日趨緩慢而已。

元朝的制度根本是非正式的，他們的政治不脫舊式貴族武人的混亂結合，可以置之不道。

到明朝又是一變。太祖發現胡惟庸謀反之後，深惡痛疾丞相制度，而立志剷除。於是以前六部尚書分掌國政，平行的直接君主監督之下。他却忘記這不是長久的辦法。因為中國的君主久已失去親裁庶政之能力，尤其幼弱的君主，非有一個或一組能以代負全責的人，是決計辦不動的。不錯，六個尚書未嘗不可以合成一組來負責，六部之中又以吏部為事實上的領袖。但是實行起來，未必能這樣如意。因為六部的立場不同，合起來必致於爭論不決。而且自己主管的事，又自己來裁決，也說不通。況且明朝宮廷的制度，尤有不同。君主的周圍全是內官，與外廷大臣不能十分接近。所以廢去丞相以後，便產生兩種新的異狀。一是由君主委任少數人備顧問代他裁決政務，二則委權於近侍以出納王言。

簡單的說來，是這樣的：在朝臣之中選出兩三人入閣辦事，這個官的名稱叫做大學士。（上面加上殿閣的名稱）。大學士本來是宋朝的一種館職，處於文學侍從之地位，原與宰相的職務不相干。（宋朝宰相有時也兼大學士）。而且大學士只是五品，比他們本官的品級要低得多。（本官許

是尙書或侍郎)。大學士逐日到內閣代皇帝閱看本章，將辦法寫在紙條上以備皇帝照寫，這個程序叫做票擬，這是在外面的一層。及至到了皇帝御前之後，他仍然不親看，不親批，而交給司禮監的太監秉筆，照着內閣所擬的代寫，這個程序叫做批本，這是在裏面的一層。

內閣在紫禁城的東南角上，地方不大，房屋也很矮小，這就是他們的辦事以及儲藏檔案的地方。事實上附近的殿閣如現在太和殿（明朝的皇極殿）的兩廊，也都可以供他們之用。我們每到北平，遊覽故宮，走到這個角落，對着剝落的丹垣，老朽的宮槐，靜悄悄地鎖着重門深院，其中一區還是磚築鐵鑄的防火建築，爲的是儲藏本章，自然就不禁想起五六百年以前，多少輔相大臣，在這裏論思密勿，多少內外官員，在這裏稟承職事。舊的塵影隨着斜陽而銷逝，真有點不勝感慨擊之。

明中葉以後的習慣，大學士是由廷推的，自九卿以至尙書都有這種希望，所以事實上誰應入閣，也可以預先知道。不是由於負有時望，就是由於結有黨援。而皇帝只是聽衆人所說，隨其愆惠而已。這種辦法更可以暴露士人階級的把持專斷操縱播弄，以尊君爲名而暗行劫奪君權之實。自唐宋以來，都是這種局面，而明爲尤甚。除了敵國外患的時期稍爲敘述一點，一到太平無事，則朋黨之風又熾了。當乙組未取得政權以前，必結合許多人攻擊在位的甲組，不惜用種種的手段，務使不能安於其位。及至乙組登台，他的本身又免不了分化，於是失意的甲組又勾結其餘來施行報復。如此循環不已，便產生下列幾種現象：（一）在位的執政自衛之不暇，更無心於謀國。（二）負責任事的人更容易招來攻擊。（三）黨的結合隨時變遷，朝秦暮楚，不可捉摸，於是是非黑白無從分別。君子之中有小人，小人亦未必全是小人，君子與小人相爭，君子與君子更不能不爭。宋朝的元豐元祐，鬧了幾十年以至於亡國，明萬曆以後，東林與非東林鬧得亡國以還還不止，這是中國歷史上黨禍最凶的時期。這種時期的宰相就等於代一種人謀權利或是代一種人報仇，一切的措施都是根據這個。像唐朝還有一個謀取政權而後施展抱負的人，宋明就非常之少了。

明朝還有一個張居正，雖然趕不上王安石的胸有整個計劃，但蓄意整飭紀綱，修明法度，那也算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但明朝宰相，（雖然明太

祖禁絕宰相的名稱，事實上仍不得不謂大學士爲宰相）的制度，是那樣腐靡而鬆懈，與唐宋不盡相同。例如六部之權已經很重，他們可以直接指揮地方政務，而唐宋的尙書必須秉承宰相之命，不能對外行文。又如唐宋宰相能隨時與君主直接商承國事，其中很少隔閡，而明朝的大學士必須假手於內官，方能與君主取得聯絡。因爲明朝君主多半不能理事，且不願與大臣見面的，所以在唐宋時作一負責任事之宰相尙不甚難，而在明朝則非有大魄力用非常手段不能提高自己的權力而運用靈活，張居正在明朝所以出色由於此，其所以慘敗也由於此。

毫無疑義，明朝的制度是不合理的。他只預備防止一個人的專權，却忽略了多數的專權也可以攪擾得不能過太平日子，並且連君主的權也剝奪得成爲真正的「孤寡」了。

崇禎時代算是最後的掙扎。君主也英明，內官之弊也除掉了。但是廷臣變成了一種空言互相攻擊的風氣，找不出真能負責的人。十七年之間，選任了五十個宰相，仍然無補於事。

清初的大學士又變成了唐初三省長官，名義雖崇高，而不一定履行其固有之職務，非由君主特別委任，則仍等於虛銜。實言之，大學士有與開國政的，有不與開國政的，事實上總是由君主在王公大臣中選任幾個人爲輔政。康熙是個首出庶物的明主，他以元首而親自秉政，他所需要的只是幾個備左右顧問整理文書的人，所以這時權勢最煥赫的還是在內廷行走的翰林官，如高士奇之類。及至雍正，藉口於辦理軍務，遂於隆宗門內（大內乾清宮之前的一排靠牆的小房屋）。設立軍機處。在以京外各處上奏都用題本，題本都經由通政司以達內廷，內閣秉承聖旨批答，爲出納一切政令之喉舌。雍正說內閣離內廷太遠，容易洩漏，於是漸漸將緊要事件改爲摺奏，（小的白紙摺比題本簡單易看）。直達內廷，直達御前，再由軍機處承旨辦理，分別發交內閣及各部各省，時間省了，效率高了，而不必要的人不致與聞機密了。這種制度，在賢明而勤能之君主下，可以指揮如意，事半功倍，綱舉目張，風行草偃，任軍機的人，只站在獻策輔佐的地位，已經爲益不少，可以盡人才之長，可以集中權力，可以防止專擅。比較上最於唐制爲近，可以說近代最進步的辦法。所以乾隆堅持着不但

維持這個制度，而且不肯更改這個名稱，是有深意的。

軍機處以大臣三人至五六七人組成。依通常之例來說，其中必有一人是親王或滿人之最親信者，又至少必有一人是漢大臣之能文有學問者，又至少必有一人是曾任外省督撫者，這些人又必兼領部署的重要職務。但本身官階不一定很高，有一品的，也有低至五品而亦列於大臣的。他們地位平等，而有一個人作形式上的領班。（或是因身分或是因資格）但是這一組大臣之中，總有一個職任最專的，如雍正時之張廷玉之流。所以軍機處以代表各方面的人物。不像明朝大學士專取翰林出身的人。

軍機處有直房巨無官署，隆宗門內之北為大臣直房，其南為章京（屬員）直房，都很簡陋，僅容起坐辦公與極簡單的會餐，却不能像唐宋宰相在政事堂接見賓客。清制不許任何人私到軍機處，禁令極嚴。軍機處所存的檔案太多了，則移入其西宮門外之方略館。軍機日行的辦事程序是這樣：天初明時就要進宮，此時皇帝已經用膳，並閱奏摺，奏事處即將已閱之奏摺分別整理，其中有已批者即照發，未批者即提出請示。另外再查有什麼應辦的事，一起預備好了，面請聖裁，其實就是在御前開政務會議。會議完了下來，分別交代章京起草，再呈上去閱定。在平時是沒有一天不見皇帝的，特別殷繁的時候，也許要隨時召見，也說不定一天見兩三次，大臣進見是全體進去的，遇有特別事故，也許單獨請見或召見。就是在巡幸的期中，也是照常的。總之清代君相之勤政，為前史所未見。而且一直到光緒時代批摺奏還是由皇帝親筆動手。因為這些皇帝都會經過與平常士子同等的訓練，而且於政務都很嫻熟，不像明朝皇帝之幼稚無能也。

軍機大臣之職務不僅例行事務而已。他們應決定國家根本政策，指示各部署各省區各統兵將帥以應行之方略，探訪各項人材以特任用，推薦適當人選以補充重要員缺，查辦重要案件，陪列宮廷重要典禮，其所掌管最瑣細之事項，直至京外各大臣之年歲生日，亦須調查紀錄，以備屆期賜壽。可以說合西漢的丞相，東漢的尚書，唐朝的政事堂，宋朝的二府，明朝的内閣為一，而且兼領唐宋的翰林學士之職。

漢朝官制本分中朝外朝兩個系統，外朝是正式的法定的，中朝是非正式而屬於君主私人的。久而久之，外朝不與中朝相聯絡呼籲，便不能有實

權，這種趨勢，到清朝益加顯著。軍機處是中朝官的身分，在清朝的術語上謂之內廷差使，此外還有御前大臣備皇帝差遣，內務府掌管理宮廷事務，南書房以文學待詔，一共四個機關，都是最清切貴近的。其中又惟有軍機大臣可以直接處理政務。所以自王公以至京外大小官吏都要仰望他們的顏色。

軍機大臣承旨指揮京外機關，在京用交片，在外用寄諭，其向外行文用軍機處印，由大臣一人掌其印鑰，用印時向宮內請出。一切諭旨奏摺可以由軍機決定其發鈔不發鈔，發鈔者交內閣。內閣變成一種承啓機關，除掉關於典章制誥而外，所有政務性質及皇室私人性質的文件都由軍機處而出。

明朝人看重內閣，固由其權重，也因為其清高。翰林館職最高之位為大學士，於是大學士為士人入官最大的榮寵，稱為閣老，又因為在翰林中佔居一席，稱為中堂。入閣以後，一班翰林都執後輩禮，死後予諡，必定有文字，是別人所不能濫得的。在士人社會中成為牢不可破的觀念。清朝雖然把實權移於軍機處，而內閣的尊榮仍未稍減。於是利用之以為榮典。正如明朝大學士必須加公孤，（太師太傅太保等）。清朝軍機大臣也必須加大學士，方為名實俱全的真宰相。得了大學士之後，人就稱為某中堂而不名，雖一品的尚書也再不敢取之抗禮。制度之演變，是很可笑的。

軍機制度之特別優點，在其辦事效率。軍機處有極完備精密的檔案紀錄，其辦事程序，規定極為明密。除非特別緣由，沒有應而不辦的事，也沒有當天不辦完的事。軍機大臣的資格條件是必須陳達政事敏捷動能，而章京更是從科甲出身的部員中挑選最才敏的來充任。（章京考試時限於一小時內作文三百字）。據道翼的筆記說，乾隆中之章京能於馬上伏木板寫小楷，寫完一段，飛跑一程，以便追上御駕。總之他們辦事敏捷有條理耐勞苦，確非常人所及。所以許多能幹的章京多由領班而升為大臣或外任督撫藩臬。

自大臣以至章京，多半出身士人，且多來自田間，習於寒素，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奢逸，但因為交際服御的必要，區區廉俸不能足用，所以收受外官少數的餽贈（名為炭敬）是默許的。

明朝結黨的習氣，清初痛加細削，在表面上已經好多了。不過骨子裏任軍機的人總不免由黨援而來，或因同鄉，或因軍誼誼誼，或因親戚，自成一個系統，此仆彼起，死而不僵。這是唐宋以來士人政治的必然現象。雖以清朝諸帝之英明獨斷察察自矜，仍不免墮入圈套。在明末的政治活動者以江南人為最有力量。清初大受攻擊，稍為轉換方向，而繼起者則為浙江人。在清末之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的，總是江浙兩省人。他們如同在金元兩朝一樣，必須取得異族的信任，利用君主的特權，才能擁護自己的利益。第一佔了科舉上的便宜，他們取高第的人比較多，衣鉢相傳，形成智識分子之中心。由此取得政地——軍機——再散入政治各層細胞中。所以清末的滿洲人實在已經失去政治的實力了。

咸豐以後，諸統兵將帥奏了大功，紛紛取得督撫地位。於是成為外重之勢。重大問題，不能不問他們的意見。但是紀綱尚在，無論如何，沒有中央的命令，總不能名正言順，正如唐朝的藩鎮，儘可以自立為留後，若不得長安的詔書，仍覺得是一種缺憾。光緒三十四年袁世凱自直隸總督入為軍機大臣，然後最有力的疆臣同時取得政本之地，雖本人不久即遭貶斥，但是黨徒已經遍布於中外，而清廷卒至顛覆於其手中。固然辛亥革命是一種種族成見の結果，也是民意對政府措施之反響，然而通觀其前後，不能不說是魏晉以來權臣移國之戲劇重演一齣。

民國成立以後，袁世凱大權獨攬，採取總統制，也就是明太祖的辦法，以一身親當庶政之衝。在他的極盛時代，未嘗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但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及至後來，改取內閣制，完全抄襲列國憲政成規，以國務總理行政全責，則又發生元首與閣僚之間的無謂摩擦。在民國史上，元首負直接行政責任呢？還是不負直接行政責任呢？依然有兩次的改變。固然時移勢異，政制有因時制定之必要。但是從歷史的觀點來說，其利病互見，有必須通盤檢點的地方。

照理論來說，民主國的元首，無論以何種方式產生，總是人所歸往的人物，不像以前的君主，也許是一個低能的小兒，所以，不能不有一個代執國政的人。元首直接負行政責任，不但是可以，而且必要的。因為中國的習慣，元首已經離實際政治太遠，所以不其為人所尊崇。如果直接負

責，可以增高權力，與效能。所怕者，元首萬一失職，足以影響他的尊嚴。但是揆諸已往的經驗，中國只患無背實心任事及有實權可以任事的人，而不是怕失職。失職之害是一時的。大家只發空論而不推諉不肯任事，任事則必挨罵，其害乃是經常的。所以民國元首不必探明太祖的成法，而不妨取明太祖的精神，視國事如家事，視家事如一身，不受庸言庸行之束縛。更應當效法諸葛亮，視國事在家事之上。

在民國的精神上，君與相是可合於一身。

不過這不是說一個人就可以治國。中國的歷史背景已經是這樣：政治操於一班智識分子手中，這些智識分子，無階級地域之分，而且新陳代謝，生生不已。沒有他們來參加，就無所謂政治。他們參加之方法，又如此的公平，縱使表面上形成黨同伐異同室操戈，而內容仍可以看出他們有穩定社會秩序的意義。能毅把握住這一點，總是好的。唐元和宋慶曆最是士論紛紜的時代，然而也未嘗不使國家陰受其福。古人說大臣之道在以人事君，然則負中樞政治責任的人也莫要於得賢才而共理。

(本篇完)

徵古錄

緩耕錄記魏翠岩與權道衡友善，市有售漢印，權已酬價，方歸取資，適魏亦見，遂遲遲之，歸語其女，女曰：「大人乃奪人所好？」魏驚悟，持送權，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魏曰：「在被猶在此也」。權曰：「在此猶在彼也」。相讓久之，竟沈之淵。今人猜忌相爭，蓋均為不放心在此在彼者。



金城銀行

總行 (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辦理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兼營
儲蓄信託業務

電話 (一二四〇〇)

浙江實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國外匯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
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本埠分行：南京西路 林森中路 愚園路 八仙橋 虹口

提籃橋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團體分紅儲蓄

每戶十五萬元 每戶十萬元

伍萬萬元
有六次獨得紅利
及四十八個一仟萬元之機會
有**一次**獨得紅利

壹萬萬元
有六次獨得紅利
及四十八個一仟萬元之機會

及五百一仟萬元之機會

儲收！多會機！紅利鉅！短期儲蓄！致富！勿失良機！各大代理銀行均可存儲

中央信託局

號九四二七一：路延 號二路津天海上：址華